

复合相互依赖视角下中拉关系的现状与特征

· 楼项飞

内容提要 21世纪以来,随着中拉双方整体实力的不断增强,中拉关系朝着越来越相互依赖的方向发展。本文以复合相互依赖为视角,认为中拉间的相互依赖正在从经济相互依赖向多方位相互依赖发展;彼此间相互依赖,既受双方经济利益和对外战略的影响,也受美欧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双方的相互依赖虽然也呈现出不对称的特征,但不会转化为单方面获取更大利益的工具,反而会成为双方开展互利共赢合作的动力。

关键词 复合相互依赖 中拉关系 现状 特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以下简称拉美国家)整体实力的不断加强,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入新的快速发展阶段。中国与拉美同属发展中国家,双方的发展阶段相近且都面临着发展本国经济及改善本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任务。虽然中国与拉美国家远隔重洋且在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上有着很大差异,但是双方没有任何历史遗留问题及根本性的利益冲突,且在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应对诸如气候变暖等全球性问题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中拉关系正朝着越来越相互依赖的方向发展。本文从复合相互依赖^①的理论视角出发,对21世纪以来中国与拉美国家的相互依赖现状和特征进行梳理,从而对中拉关系进行再思考。

一 复合相互依赖的内涵与特征

相互依赖现象的存在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较系统的理论,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N.库珀(Richard N. Cooper)从复杂的国际经济现象中提炼出来的;之后,国际政治学者罗伯特·O.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S.奈(Joseph S. Nye)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这一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已成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使用最广泛的理论之一,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理论上最精致完美、政治与经济结合得最好的理论”^②。

(一) 复合相互依赖的内涵

国内外学术界至今仍未对相互依赖的内涵界定形成共识。库珀在其《相互依存经济学:大西洋国家的经济政策》一书中认为:相互依赖是“一国经济发展与国际经济之间的敏感反应关系”^③。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对库珀的相互依赖理论作了进一步梳理和扩展,他们认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④

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从库珀的理论中进一步得出了相互联系并不等于相互依赖、相互依赖并不局限于互利的情形以及相互依赖并不一定导致合作的论断。首先,他们认为,当交往产生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这些影响并非一定对等)时,才能称之为相互依赖,否则只不过是相互联系而已。其次,他们以冷战时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形成的战略相互依赖关系为例,证明相互依赖并不一定以互利为导向。最后,他们用“为人父母者皆知,烤制大馅饼并不能阻止小孩子就分多分少而争吵”^⑤的观点,说明相互依赖并不排除主体之间因利益分配而产生竞争和冲突的可能性。

(二) 相互依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把不对称的相互依赖视为权力的一种来源,并提出了敏感性和脆弱性这两个概念来分析权力在相互依赖关系中是如何产生的。

^① 国内学者把英文“interdependence”译为“相互依赖”或“相互依存”,笔者在文中使用“相互依赖”一词,引用文字除外。

^{②③} 转引自樊勇明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页,第25页。

^{④⑤} 罗伯特·O.基欧汉和约瑟夫·S.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四版,第9页,第10页。

收稿日期:2013-03-15

作者简介:楼项飞,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在读博士生。(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上海 200233)

他们认为,敏感性指的是某政策框架内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的快慢和代价的大小,而脆弱性则表现为行为体为有效适应变化了的环境而所需付出的相应代价。敏感性与脆弱性虽然都包含了代价的尺度,但两者间是有差异的。它们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政策框架是否发生变化,前者以政策不发生变化为前提而后者则正好相反。此外,脆弱性相互依赖更具政治和战略意义。不对称相互依赖所包含的敏感性和脆弱性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国家在同一相互依赖格局中的获利能力和程度的不同,从而使一些国家获得了强迫另一些国家做它所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①

(三) 复合相互依赖的特征与政治进程

复合相互依赖具有以下3个基本特征。其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它包括政府精英间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非政府精英间的非正式联系以及跨国组织等。其二,国家间关系的日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其三,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以上3个主要特征导致不同的政治过程,这些政治过程通过以下渠道和方式把权力资源转化为控制权力的结果。第一,联系战略。在武力作用下降的条件下,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试图把它在某些问题上的优势地位同其他自身所关切的问题联系起来以达到获得更多权益的目的。第二,议程设置。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各问题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等级区分,这使得国家间外交议题的确定也变得更加微妙和多样化。一些行为主体都希望把自己关注的议题扩大或缩小来维护自身利益。第三,跨国及跨政府关系。由于联系渠道的多元化,非国家行为主体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日益活跃,各行为主体对外部变化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将直接影响自身和国家行为。第四,国际组织。由于多渠道联系的存在,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各种政治经济博弈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②

虽然如同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指出的那样,复合相互依赖概念并不能完全忠实地反映世界政治现实,但他们提出的敏感性和脆弱性概念以及对国际政治权利产生的渠道和方式的论述对于分析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中国与拉美国家间的关系既符合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理论的一些特征,但同时具有发展中国家间相互依赖的一些特有属性。

二 中国与拉美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现状

随着中国与拉美国家关系的快速发展,双方间的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不断扩大,双方间相互依赖也从单纯的经济相互依赖向多方位相互依赖扩展。

第一,经济相互依赖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从而促进了中拉经贸关系的合作与发展。中拉经贸合作领域不断拓宽,科技含量不断提升,呈现出从资源和能源领域向高科技领域扩展的良好态势。一方面,双方贸易从一个低起点进入到了实质意义上的增长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虽然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但却使中拉经贸合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出来,双方的贸易结构也得到了调整和优化。另一方面,投资和金融合作日益扩展,拉美已成为中国第二大对外投资目的地。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1年12月,中国对拉美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存量达540亿美元,涉及能源、资源、农业、生产制造和加工等领域。到2011年年底为止,拉美国家在中国的累计实际投资额为1533亿美元,占全球累计对中国实际投资额的13.1%。^③中拉间开展金融合作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中国银行业在拉美的业务从传统的参与银团贷款、对外承包工程等领域向商业性贷款的领域拓展。^④2009年1月12日,中国正式加入美洲开发银行,成为该集团的第48个成员国,为中拉开展金融、经贸、投资等活动提供了新的重要平台。2012年6月,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发表演讲时宣布,中方将设立首期50亿美元的中拉合作基金和100亿美元的中拉基础设施合作专项贷款;温总理同时指出,中国正考虑同更多拉美国家商签本币互换协议,开展本币贸易结算,相互增设银行分支机构。

第二,联系渠道不断扩展。一是中拉间官方交往日益密切。21世纪以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以及其他党和国家主要领

^① 樊勇明著:《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5~38页。

^② 罗伯特·O.基欧汉和约瑟夫·S.奈著,门洪华译:《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四版,第23~35页。

^③ 张昆生:《对新形势下加强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关系的几点看法》,载《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5期,第5页。

^④ 柳明、王发军:《中国在拉丁美洲的贷款》,载《拉丁美洲研究》,2012年第4期,第19页。

领导人先后多次访问拉美国家；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领导人都曾访问过中国。此外，双方领导人还经常在联合国大会、20国集团峰会以及其他国际峰会上进行会晤。中国分别同巴西和墨西哥建立了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和副外长级战略对话机制；同委内瑞拉、墨西哥和巴西建立了双边高层合作机制；同建交的拉美国家都建立了外交部间政治磋商机制。二是双方非官方机构和人员间的往来日益频繁。从经贸层面来看，中拉间经贸合作的深化使得双方经贸领域的人员往来逐渐增多，企业家代表团已成为双方领导人国事访问代表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在中拉两地举办的各类国际性会展成了双方企业寻求商机的重要场所。从人文交流层面来看，双方的人文交流日趋多样化。除双方政府间的和民间的文化展览和文化团体交流活动日益频繁以外，双方旅游和留学人员往来也日益增多。

第三，国际机制变革中的共同利益不断增多。中国和拉美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都希望推动世界多极化、民主化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1世纪以来，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大国在多元化外交指导下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的鼓舞下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以期在国际格局大变革中谋求有利地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在更深入和广泛地融入国际社会。近年来，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占世界经济比重上的此消彼长，为新兴国家参与国际机制改革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中国、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都加入了20国集团；中国和巴西同为“金砖国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在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中的合作初见成效。中国、巴西、墨西哥等国在IMF的份额和投票权也得到了提升。今后，新兴大国之间仍然需要不断磨合，在涉及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国际事务中相互协调和支持，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机制变革中的话语权。

三 中拉间相互依赖的特征分析

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使得各国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网络。在此网络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具有鲜明的不对称性，发达国家的获利能力和获利程度都要大于发展中国家，这使得发达国家常常可以利用不对称相互依赖的优势成为国际规则的倡导者和制定者。不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

断扩展，经济相互依赖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提升，国家间形成了紧密联系的、常态化的跨国商业往来，日益机制化的政府间和国家间的多渠道联系，使得各国对彼此政策的敏感性越来越高，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传统的军事实力和国家安全不再是影响国家议程设置的主导因素。中国与拉美地区相距遥远，双方从未出现过军事冲突，也不存在领土争端等历史遗留问题，双方关系的不断深化是建立在以共同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基础之上的，双方的相互依赖具有以下特征。

（一）影响中拉间相互依赖的因素具有复杂性

中拉间的相互依赖不仅受到双方内部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一方面，拉美各国虽然都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但由于其经济利益和对外战略的不同导致它们在发展对中国关系时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由于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较强，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南美国家同中国的经贸关系比较密切，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更为敏感，因此更加重视发展对中国的关系。中国虽然是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由于墨西哥从中国对拉美投资中的获益较少，与中国在第三方市场存在利益冲突且在对华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地位，因此，墨西哥与其他拉美地区大国相比，它对发展与中国的关系比较冷淡。另一方面，随着中拉间经贸关系的加深，双方的共同利益虽然增多了，但贸易摩擦日益加重，甚至超越了双方的实际贸易水平。拉美国家对中国的反倾销强度已超出世界对中国反倾销的平均强度；中拉贸易摩擦涉及的国家 and 商品范围日渐增多，拉美国家对中国贸易救济手段日趋多元化，对中国产品的出口限制更为隐性化。中拉贸易摩擦的增加既与中拉企业在拉美地区内部及第三方市场上的竞争冲突有关，也与中拉贸易结构和流向的不平衡问题有关。此外，中国企业经营行为的不规范也是产生中拉贸易摩擦的重要诱因。^①此外，中拉间的贸易和投资增长主要是在21世纪以来的十几年里出现的，而且大多集中于南美国家的原材料和能源领域，双方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仍缺乏长远的、可持续的战略规划，这非常不利于双方经贸关系的健康有序发展。

作为拉美的传统贸易伙伴和直接投资来源地，美国和欧盟的跨国企业不仅了解拉美市场并且已经

^① 有关中拉贸易摩擦的具体数据，参见岳云霞：《避免中拉贸易摩擦升温》，载《进出口经理人》，2009年第5期，第66页。

占据了绝对优势。近年来,随着拉美地区一体化进程的深入发展,拉美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处理地区事务的能力也大大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不过,由于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在地缘上与拉美有着紧密联系,美国的任何经济发展变化、贸易政策动向都会对拉美的切身利益产生直接影响。^① 欧盟与拉美的跨区域对话和合作不仅占据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方面的优势,而且都以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和积极倡导多边主义为基础。自21世纪末以来,经过一系列政治磋商和经贸谈判,欧盟与拉美国家逐步建立和完善跨区域对话和合作机制。欧盟是拉美开展经贸合作、获取援助和平衡美国影响力的重要战略支点。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以及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使得美国和欧盟对拉美的进出口贸易额、直接投资额以及政治关注度都出现了下降,但随着美国和欧盟经济的复苏,它们与中国在拉美市场上的竞争将变得更为激烈,它们将对中拉关系的深入发展作出重新评估并制定新的应对战略。

(二) 中拉间的相互依赖具有不对称性和互利共赢性

中拉间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综合实力的不对称性。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近几年来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最有力的引擎。拉美地区的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虽有所加强,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这一地区虽然也是少数几个实现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地区之一,但这一地区要形成类似欧盟这样的区域一体化组织仍面临许多挑战。二是贸易地位的不对称性。中国是拉美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和直接投资来源国,是巴西和智利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是阿根廷、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拉美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并非同等重要。中国的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欧盟和亚洲地区,拉美是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国与拉美各国都有经贸往来,但双方的贸易额主要集中在巴西、智利、墨西哥、阿根廷、秘鲁等国。

中拉间相互依赖虽然具有不对称性,但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符合双方的利益。首先,中国与拉美国家都奉行独立自主和多元化的外交政策,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从中国方面来看,中国的对外政策决定了中国不会因相互依赖中的不对称性来谋求自身的利益。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再次重申,中国始终不渝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友好合作。^② 其次,双方都推行经贸合作多元化战略且双方经贸结构互补性在进一步加强。中国把拉美视为实行经贸合作多元化战略的重要地区。拉美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增长最快的区域以及某些重要资源的来源地,它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重大战略意义。^③ 而拉美希望中国成为其推行经贸合作伙伴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平衡其对美国的过分依赖。中拉经贸关系的加强是拉美地区成功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因素。中国对拉美的投资和贷款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这种投资和贷款为拉美国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了有力支持。最后,中国与巴西等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有利于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化程度的深入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调整和变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与拉美国家间只有不断挖掘双方的合作潜力,夯实双方开展合作的基础,才能使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具有更多的共同利益,才能在国际体系变革的南北方博弈过程中变得更有默契。

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拉美地区还不会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但其重要性正在不断上升。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拉近中拉关系提供了机遇。中拉间的相互依赖虽然具有不对称性,但这种不对称性并不会阻碍双方相互依赖关系的建立,反而会成为双方增进了解、扩大政治互信和促进双方关系向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有利条件。当前,中国与拉美国家都处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模式的重要时期,这是扩大相互投资和改变双方贸易结构的有利时机。双方需要在前期贸易合作的基础上提高各自的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尽快制定和完善双方政治和经贸合作的中长期规划,从而为经济相互依赖的可持续性和政治相互依赖的深化提供有力保障。

(责任编辑 蔡同昌)

^① 程洪、于燕:《试述中拉关系中的美国因素(2001~2010)》,载《拉丁美洲研究》,2010年第5期,第18页。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48页。

^③ 沈安:《关于中国未来对拉美外交战略的思考(上)》,载《拉丁美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7页。